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

蒋培¹, 李伟红²

(1.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 浙江杭州 311300;
2. 浙江大花园建设研究院, 浙江丽水 323000)



摘要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生活垃圾分类越来越成为全国各地农村尝试开展与实施的环境治理工程, 但如何建立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一直困扰着地方环境管理者。通过对浙北码头村的案例分析, 总结该村在长期实践中的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经验以及不同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行动策略, 并深入挖掘长效机制建设背后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等社会基础。最后, 基于理论分析与实地调查的互动联系, 提出内生于村庄社会的制度规范、有效的组织动员结构、可适用的治理技术手段是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 以此来反映符合农村社会特点、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 长效机制; 社会基础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23)05-0132-11

DOI编码: 10.13300/j.cnki.hnwkxb.2023.05.013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将惠及广大农村居民。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就十分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从2018年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到2021年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 都突显了农村环境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作为人居环境整治的核心内容, 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2016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指出,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 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2018年, 习近平在上海市视察时提出, 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

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社会工程, 需要政府、居民、市场、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共同参与^[1]。生活垃圾分类从前端源头分类、中端分类运输到末端分类处理, 需要从制度引导、宣传教育、日常管理、奖惩机制、监督方式、市场参与、组织动员等方面入手开展工作。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 还是相应的政策制度、行为规范、监督机制都需要较大的投入。生活垃圾分类是一个“自上而下”政府管理与“自下而上”公众参与相结合的社会行动, 需要每一位公众都能够形成相应的分类意识与分类行为, 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体系。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更需要因地制宜地构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2]。不同于城市社区生活方式的同质化, 农村社会在自然地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性, 对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在地方政府政策制度的支持下,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建设更需要内生于村庄社会, 形成符合农村社会特点的长效治理机制。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不仅是政府推行的环境治理工程, 还是农村居民基于长期生产生活实践总结形成的治理经验, 更是农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转变的重要表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

收稿日期: 2023-03-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三角地区乡村工业绿色转型的社会机制研究”(20CSH076);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陕南地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研究”(2019G006)。

制的形成是基于内生性村庄制度规范、有效的组织动员结构、可适用的治理技术手段的协作过程,促进农民养成持久有效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

一、理论回顾:长效机制建设视角下的生态治理

从社会学研究视角来看,长效机制就是能保证事物各组成因素的结构、功能实现最佳效果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简单地说就是“带规律性的最佳模式”。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是指,在生态治理过程中,以“良治”为目标,促进生态治理的结构、功能、运行等实现最大效用的运行体系和作用原理,它是贯穿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各种因素的本质联系^[3]。概括来说,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建设需要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方面,生态治理需要形成比较规范、稳定、配套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具备推动制度正常运行的动力机制。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建设是一项系统社会工程,从内外两个维度来分析,不仅需要具备相应的外部政策、制度环境,也需要内部各主体参与其中。有学者对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建设所需的各项条件与基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是相互联系、耦合共生、辩证统一的关系。具体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确立了根本路向;二是生态治理长效机制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抓手;三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生态治理长效机制”耦合于人类社会治理范式的现代转型^[4]。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我们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角度入手来分析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的建设情况。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具有一种结构性特点,符合当前全社会生态治理的总体趋势和发展目标,是当前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

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可持续的治理模式,符合各方主体的利益需求,达到了一种最佳状态。根据《辞海》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它是一种要求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战略^[5]。1987年,国家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在文件中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从生态治理来看,也是如此。生态治理需要符合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保持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协调一致^[6],从而实现区域社会中生态治理、经济增长、社会和谐与文化繁荣的目标。所以,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具有一种内生性特点,正是基于本土社会内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形成了可持续的生态治理方式。

与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相对的是当前基层治理过程中存在的“运动式治理”“断续型治理”,此类治理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治理实践呈现不连贯性和不确定性,基层治理主体总是倾向于在诸多日常工作中选取那些上级最为看重、检查最为严苛且时限最为接近的工作成为该阶段的“中心工作”,采用运动化或突击化的方式集中调配资源以达成某种治理任务^[7]。从长期的角度来分析“运动式治理”“断续型治理”不仅治理行政成本较高、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还会严重破坏基层治理的自发性秩序和常规性行政规则。可见,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的建设应基于一些连贯的、稳定的生态治理制度,以合适的治理方式来推进生态治理工作的开展。

所以,生态治理只有保持结构性、内生性、连贯性的特点才能够促进长效机制的建设,以一种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方式来推进生态治理工作的开展。有学者指出,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是内容多样与层次分明的结构系统,乡村生态绿色法治机制、乡村绿色创新驱动机制、乡村生态文化培育机制以及乡村社会主体参与机制是其核心要素,共同构成乡村生态治理复合机制,从而保障乡村生态绿色发展^[8]。基于对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的特点以及内容组成情况的分析,可以尝试构建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的分析框架。一是,生态治理应立足于稳定的社会结构,即需要具备相应成熟治理结构和治理环境,能够保持生态治理得以稳定、持续地开展下去。二是,生态治理需要依赖一系列社会规范。在比较成熟的政策制度之下,生态治理工作能够持续、稳定、连贯地推进,有助于构成长效的生态治理机制。三是,生态治理应形成稳定的实践主体,需要通过各类组织手段、组织工具来构建相对稳定、一定规模的实践力量,推进生态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四是,生态治理需要构建有效的动力机制,即只有实

践主体持续地开展治理实践,才能够真正改变生态与环境状况,稳定、持续地推进生态治理机制的建设。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是长效生态治理的构成部分,受政府、村庄与村民等多方主体行动的影响。从政府视角分析生活垃圾分类问题,主要是从垃圾分类的政策制度、宣传教育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入手。从已有的研究情况来看,大部分生活垃圾分类都是以地方政府为发起人,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推行方式来促使居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从村庄视角来分析生活垃圾分类,则需要因地制宜地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构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基于村庄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形成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组织、管理与监督机制,有效地动员居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和形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从村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来分析,内外条件都有可能造成个体行为发生变化。一方面,村民个体的意识高低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有着直接影响^①,需要借助宣传教育、价值观培养和生态认知提高等方面来促进村民养成自觉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另一方面,村民个体的意识与行为并不总是一致,垃圾分类行为还容易受制度规范、科学技术、奖惩机制等外部因素影响,需要以适当的引导方式来调适村民的垃圾分类行为,提高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率。

二、经验呈现:浙北码头村的生活垃圾分类

浙北码头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经历了一个长时段过程,最终形成了长效管理机制,这也得益于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类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①。

1. 浙北地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最先由地方政府发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制度。从省级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来看,2018年浙江省发布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范》的地方标准。而从码头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情况来看,早在2016年,长兴县就高度重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先后出台了《关于扎实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长兴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工作方案》《长兴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创建工作方案》《长兴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文件。结合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推广到全县,实现了全县207个行政村、2066个自然村农户的全覆盖。

考核制度是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重要保障。长兴县环境管理部门把建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长效管理机制作为重要目标,考核制度则是重要的支持手段。一是结合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等村庄公共事务的开展,设立环境信用体系,建立全县范围内的“诚信档案”制度。把农户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纳入到个人诚信档案,并作为村庄内部评比以及申请入党、子女入伍、银行贷款等的重要考核指标。二是通过线上、线下“双晾晒比拼”制度。建立线上县、乡、村三级垃圾分类的工作微信群,及时反馈与通报日常生活垃圾分类不标准、不到位、不合格等情况,从源头就狠抓垃圾分类工作。建立线下由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负责包干的工作网格,引入“红黑榜”制度。利用村庄的“曝光台”和布告栏公布片区负责人、保洁员、网格员与村民编号信息,每周每月公布相应的考核得分。三是强化日常“明察暗访”工作,实行“日查、周报、月考、季评”的全过程分期考核制度。从县级部门到乡镇主管部门,再到每一个村庄,工作人员都要进行现场指导、宣传发动,对户分质量、清运环节、示范村创建、环境卫生等情况进行逐项考核,并纳入乡镇、村庄的月晒季考以及年终综合考核的重要依据。

地方政府出台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是基于长期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工作的总结。长兴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制定与出台,是当地农村长期生活垃圾分类实践的结果,符合当地农村、农业与农民的发展要求。农民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擅于把日常生产、生活方式与垃圾分类结合在一起,以最小的治理成本来获得最大的治理成效。以传统农村社会为例,基于农民的生产生活特

^① 根据学术惯例,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进行匿名化处理。

点形成了“有垃圾无废物”的循环利用模式。现代农村社会虽然难以处理各种工业制品垃圾,但依然可以找到很多具有农村社会特点的垃圾处理方式。例如,通过饲养家禽家畜消化易腐垃圾,从源头上减少了易腐垃圾的数量。此外,在生活垃圾分类网格管理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把各类地方精英作为网格管理的重要组织者与管理者,积极动员与组织村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2. 码头村的生活垃圾分类历程

码头村位于浙北长兴县境内,距离县城大约12千米,距镇政府4千米。村域面积4.42平方千米,耕地面积3242亩,人均耕地面积为1.4亩。全村辖1个中心村、5个自然村,有12个承包组。农户763户,人口2363人(其中中共党员64人)。2021年村集体经济240余万元。码头村从2005年开始着手规划新村建设,由各自然村农户拆迁后集中建房形成新村。2012年,结合土地综合整治中心村建设,规划节约土地指标120亩。截至2018年底,全村已有520户在中心村建房,集聚人口1800人。新村设有农贸市场、卫生服务站、警务站、餐饮、超市及商业网点,配套设施齐备。

码头村从2017年开始推行生活垃圾“两分法”分类,在全村范围内推广生活垃圾分类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困难的过程。最初,大部分村民并不能准确地进行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也不能理解垃圾分类的现实意义,导致垃圾分类工作停滞不前。为了推行垃圾分类工作,村干部开始引导与示范,具体为每天上午由一位村干部、一位宣传员和一位收集员在每个小区对“两分法”进行上门宣传、劝导与示范。经过约一年时间的宣传与实践,码头村村民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成熟的垃圾分类习惯。“两分法”主要是在每户农户房屋前摆放双色垃圾桶,包括“会腐烂”和“不会腐烂”两类。每日上午垃圾清运员上门对农户的垃圾进行分拣、收集与清运。

2019年,码头村对生活垃圾分类机制进行了提档升级,采用“四分类”方法来处理垃圾。四分类主要包括可回收物、易腐垃圾、有害垃圾与其他垃圾。同时,码头村对村内的生活垃圾清运方式进行了创新,采用地理式集中收运处理方式,提高了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码头村将每户农户房屋门口摆放垃圾桶的方式,改变为“定时定点”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的方式。在新村建设区域共设置4个地理式集中收运垃圾处理站点,村民在每天上午5:00—7:00和下午5:00—7:00时段进行生活垃圾的投放。同时,码头村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系统还结合了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及时登记村民的投放次数并设置奖励积分,除此之外还装设了在线抓拍装置,及时发现各类违规的垃圾投放行为。

三、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长效机制建设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不仅需要外部政府政策的支持,还需要村庄内部管理制度、管理组织、治理体系与实践方案的设计和 implement,才有可能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

1. 内生性村庄规范的形成

(1)村庄内部的治理制度。码头村生活垃圾分类虽然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但在村庄内部则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设置了相应的治理制度。农村环境治理应体现“中和位育”的治理理念,充分发挥农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以及农村环境治理应回归乡村生活主体^[10]。从维持村庄人居环境整治长期效果的目标出发,建立村庄内部环境整治的长效管理制度,其中包括生活垃圾分类的具体制度。一是,汇报制度。码头村在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设立了“102030”例会制度,村庄内每10天召开一次例会,通报前一阶段的督查情况,确定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和工作重点。同时,各片区负责人进行工作汇报,分析阶段工作情况,适时进行工作部署。二是,工作报告制度。各小组定期进行环境整治工作总结,把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落实情况、未完成事项及原因进行全面的总结,并向村委进行汇报。三是,督查制度。督查主要是针对村庄内的保洁员、清运员进行检查,村庄值班负责人需要每天上午、下午对相关人员的到岗情况、保洁质量、清运情况进行及时督查。四是,评比与通报制度。对生活垃圾分类等环境治理工作组织阶段性的全村评比,树立典型,激励先进,鞭策后

进。同时,对存在问题不予整改的,利用村曝光台进行曝光,并纳入诚信指数考核。

码头村在生活垃圾分类开展过程中,结合村庄实际情况制定与出台了一系列生活垃圾分类的管理制度。各项制度在生活垃圾分类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与当地农户的需求紧密联系起来,进一步提高村内管理制度的治理效能。例如,在生活垃圾分类开展过程中,最开始规定农户投放垃圾的上午时间段为6:00—8:00,但是这一时间段规定并不合理,因为大部分农户在这一时间段已经去上班或在上班的路上。针对此问题,村两委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走访,了解了大部分农户的想法之后对生活垃圾投放时间进行优化,上午时间段设定为5:00—7:00。村内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的优化,不仅满足了农户生产生活方面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了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实地调查发现,村庄内部的多项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不断调适形成的结果,在生活垃圾分类开展过程中进行不断的调适与完善,以达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有效执行的目的。

(2)垃圾分类的奖惩机制。在村庄内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各类奖惩机制的设置对农户的分类行为有重要影响。从码头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奖惩情况来看,可以分为物质层面和非物质层面的奖惩机制。其一,在物质奖惩机制设置方面,以奖励引导为主,惩罚警示为辅。码头村在全村范围内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积分兑换制度,即农户通过正确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行为每次可以获得0.1个积分,进行可回收物回收也可换取不同数值的积分。生活垃圾分类形成的积分可以在村庄积分兑换超市进行生活用品兑换,有效地调动了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从惩罚方面来看,由于村两委没有执法权,难以直接进行行政处罚,但可以通过城管、环卫等部门对屡不开展垃圾分类的农户进行每次200元以下的处罚。村庄内则通过不给予奖励方式来进行变相的经济处罚。其二,在非物质奖惩的设置方面,农村社会的人情、面子对农户的影响较大。农户日常的交往行为都会碍于相互之间人情、面子的影响,受村庄社会舆论的影响较大。正是基于这一点,码头村设置了垃圾分类曝光台、通报机制来督促后进农户逐步参与生活垃圾分类,让经常处于排名靠后的农户主动纠正不合理分类行为。在每年年终全村“户主大会”上,根据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表现以及其他村庄公共事务参与情况评选出“十星级文明户”“垃圾分类示范户”“美丽家园”等优秀代表并进行物质奖励。对于一些后进农户,在“户主大会”上也会进行通报批评,让对应的农户承受一定的村庄舆论压力。

2. 网格化治理体系的建设

(1)网格化体系的组织结构。码头村从2017年开始进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之后,在村庄范围内就设立了村庄网格化管理体系。目前,全村共形成了7个大的网格,63个小网格(治理单元),覆盖到每一户农户。其中,在7个大网格结构中,主要是由村干部组织负责。在大网格内部又进一步细分为6~14个数量不等的小网格,每个小网格(治理单元)则主要由村内的党员同志担任小网格长。小网格一般包括8~10户农户,由每个小网格长(党员)负责进行日常联系。村书记(主任)对整个网格化管理体系最终负责,全面管理与监督村庄生活垃圾分类事务。

针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宣传与动员,码头村建立了“村书记—村干部—党员—农户”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村庄生活垃圾分类行动结构。每一户农户都被纳入小网格之中,并受对应的小网格长(党员)的组织与管理;小网格又被纳入7个大网格结构之中,由村干部负责联系。在网格化管理结构中,村书记在村庄范围内发布相应的通知信息与管理指令,经过各大网格长传输给每个小网格长(党员),再传达到每一户农户。网格化管理体系的产生,改变了原来传统村庄“村干部—小组长(或者村民代表)”的治理结构,形成了更加完整、有效、精细的村庄治理体系。同时,网格化管理体系充分吸纳了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党员、妇女代表等,进一步夯实了村庄整体的治理结构。

(2)网格化体系的运行方式。码头村由“村书记—村干部—党员—村民”组成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建立了相对完整、有效的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动员与管理机制。

首先,从宣传方面来看,网格化管理体系利用村干部、宣传员与清运员上门宣传与示范的方式来推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7个大网格长在一周时间内进行轮流值班,在本网格内开展村民生活

垃圾分类的宣传与教育活动。通过常态化的宣传工作,村民逐渐了解了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与要求,结合实践也进一步深刻领会了生活垃圾分类对人居环境改善带来的正面效应。在垃圾分类的初始阶段,网格长、宣传员(妇女代表)和垃圾收集员组成网格化管理体系中的重要宣传、教育力量,每周都会向农户进行上门宣传与分类示范。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与教育,村庄形成了较为标准、有效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

其次,从动员方式上来看,网格化管理主要是通过村干部与党员在网格内的联系与动员机制来促使村民更好地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网格化治理在结构层面既强调治理主体的共同在场,亦强调治理主体位置的权变调整^[11]。村庄内部的动员机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从村书记到普通村干部的动员层级。生活垃圾分类一般是由地方政府发起,通过行政指令的形式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从村庄内部来看,村书记(主任)在村庄内按照政府的行政指令来推进工作,则需依照农村社会的人情关系、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来鼓励其他村干部推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二是从村干部(大网格长)到党员的动员层级。相对于村干部内部的权力关系影响,这一层级的动员主要还是需要结合人情关系、身份认同鼓励各小网格长(党员)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三是从党员(小网格长)到普通农户的动员层级。在这一层级的动员机制中,党员与农户之间更多的是基于人情、面子、关系来开展工作。

最后,从生活垃圾分类的日常管理机制上看,网格化体系实现了“团体管理、责任到人”的管理模式。码头村全村7个大网格和63个小网格,在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是以小网格为治理单元进行日常管理。每个小网格长(党员)需主动联系网格内的农户,有效开展不仅包括生活垃圾分类参与,还包括疫情防控、邻里纠纷调解、上报审批等日常事务。小网格长对联系的8~10户农户日常情况也需要掌握,按照村内规定及时撰写“民情日记”,并定时宣传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拍摄照片动态记录情况。同时,从农户的角度来看,网格化管理体系的建立也有助于解决自身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提高生活满意度。

3. 可适用实践方案的诞生

结合农村的自然环境、居住空间、社会关系等实际情况,形成具有适用性的生活垃圾分类实践方案,有助于当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的建设。

(1)地理式垃圾分类设施创新。不同于一般的农村,码头村在2008年进行全域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很多农户的房屋排列比较规整和集中。当前,全村726户农户中有623户都集中在新村建设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村。码头村针对村庄人口较为集中与农户生产生活特点,设置了地理式垃圾分类装置,采用“定时定点”方式来开展村庄内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围绕着新村居民区,码头村共设置了4个地理式垃圾分类投放设施,方便新村村民进行生活垃圾投放。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方便当地农户进行可回收物的及时回收,在垃圾厢房边上还设置了可回收物回收装置。从2019年开始全村大部分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方式从“两分法”转变为“四分法”,且农户自主地把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到垃圾厢房替代了垃圾清运员上门收集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户自觉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意识与行为,形成了全村范围内完善、健全、长效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

(2)实时在线监控技术运用。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普遍。数字技术的变革与应用牵引着全球治理转型,推动了数字赋能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创新与地方实践探索^[12]。自2019年码头村开始采用固定地理式生活垃圾分类装置之后,大部分农户都需要把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到相应装置。为了进一步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监管力度,码头村联合阿里巴巴互联网公司设计了一套“在线抓拍”装置,具有及时感应、拍摄并上传系统的功能。这套“抓拍”系统与垃圾分类督导员联合起来,可以有效地推进村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避免因事实不清楚引起矛盾、纠纷。此外,每一户农户都会拿到一张具有家庭信息的IC识别卡,农户在投放生活垃圾时需要使用IC卡才能打开垃圾桶进行投放。每户农户一天只有两次打开垃圾桶盖的机会,需要在20秒内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否则,垃圾桶盖会自动关闭。相关的数字信息也会自动传输到控制系统,作

为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考核和积分兑换的重要依据。

(3)可持续积分兑换机制建设。码头村在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且长效的物质奖励与兑换机制。不同于市场交易方式,码头村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过程中设置了可回收物的积分兑换板块。当地农户在处理可回收物时,可以直接到村内兑换超市直接进行积分兑换。不同的可回收物分别被赋予了相应的积分分值,例如,报纸每斤可以兑换0.6个积分,塑料瓶每斤兑换0.5个积分,等等。各类可供兑换的生活用品也被赋予了相应的积分,例如,抽纸每包需要1个积分,牙刷需要2个积分,香皂需要3个积分,等等。码头村第一批兑换物品通过批发形式进行采购,花费2000元。而收集的第一批回收物品,出售给长兴县可回收物处理企业共获得2500元,扣除兑换物品成本后结余500元。码头村垃圾分类积分兑换机制,利用可回收物的经济价值实现了常态化的垃圾分类行为奖励。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农户持续地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并开创了农户之间进行生活垃圾分类良性竞争的局面。

四、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分析

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情况来看,内生性管理制度、网格化管理体系以及可适用实践方案的设计与形成都依赖于农村的各项社会基础。

1. 地方精英的组织与动员

地方精英的组织与动员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实施过程的核心力量与重要纽带。围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形成的村庄网格化管理体系,表面上是一种基于村两委、党员、村民代表等人员的类行政管理机制,实质上则是村庄的一种内生性社会结构。社会现实是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治理思维和治理模式应该根据社会事实的变化而发展创新^[13]。各类地方精英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不仅推进了村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机制的建设,还积极动员与组织村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为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是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产生来看,地方精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生活垃圾分类最早是由地方政府发起,但具体落实到村庄则主要是以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等地方精英为主进行组织与推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方式的形成是地方精英基于农村社会的现实问题与关系网络创造的一种新型村民自治形式。从生活垃圾分类的村庄规范设立情况来看,地方精英也发挥了重要引领与协调作用。随着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不断完善,与之配套的各项村庄规范也逐渐出台,进而巩固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地方精英作为重要发起人,按照村民的生产生活习惯设计与设定了相应的制度规范,有效地保障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有序开展。此外,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可适用技术依赖于地方精英的创新创造。相比于普通村民,地方精英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产生之初更具有创新性,能够结合村庄的实际情况和外来的信息资源,形成符合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特点的垃圾分类技术。

二是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维系来看,地方精英是重要的组织力量。地方精英具有更强的组织力来维持生活垃圾分类机制。以小网格为例,小网格长(党员)作为村庄内的地方精英,比普通村民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与发展路径,更容易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联系所在片区内的8~10户农户。对于普通农户来说,也更加愿意配合此类地方精英的管理,以形成互惠关系。地方精英也是垃圾分类制度实施与推行的执行者。围绕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形成的一系列村落规范与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依赖地方精英的执行与推行,并进行示范。另外,地方精英在生活垃圾分类设施维护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正常运行依赖各类分类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需要地方精英通过各种渠道来吸引资金、项目的投入,不断建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

三是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更新来看,地方精英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内外条件的影响下随时进行更新换代。地方精英是促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更新的重要中介^[14]。地方精英及时地接收来自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度与行政指令,通过自身的有效吸收与消化,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更新换代。地方精英通过多样化的途径接收最新

信息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创新。地方精英具有更广泛的社会视野和更丰富的社会资源,能够有效地推进各类新技术、新手段融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从而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可适用性。此外,地方精英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变化形成了自身的观点与想法。地方精英在面对经济社会变化的同时,能够主动、自觉地把村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建设与外部经济社会和内部村庄社会变化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创新一种最符合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生活垃圾分类方式来实现更新,在此过程中,地方精英擅于利用自身的智慧来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

2. 熟人社会的依托与支持

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所依赖的社会基础来分析,熟人社会的依托与支持是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建设的本底,形成了一种对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5],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一是村庄内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的运行依托于农村社会结构。不同于地方政府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村庄内无法采用强硬的行政管理手段来要求农户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农户的行动逻辑表现得更加复杂化,依托于利益关系、社会关系、人情面子、日常伦理等。所以,村庄内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更多的是利用各种关系与手段来影响农户的行为,甚至是采用多种手段轮流尝试的方式来促使农户准确地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刚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叫村干部、妇女代表、清运员上门进行宣传与教育。通过多次、反复地开展工作,农户逐渐开始进行垃圾分类并逐渐意识到垃圾分类对改善环境带来的效果。我们也是充分抓住农村生活的特点来推进工作。比如在农村,妇女同志主要承担家中清洁与投放垃圾的工作,所以,我们也是利用妇女代表来联系村内的妇女参与垃圾分类活动、开展垃圾分类培训与建立妇女联系群等,从女性角度入手来提高村庄生活垃圾分类率。”(20220223 码头村裴书记访谈录)

二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网格化管理体系的设立依赖于农村社会关系。网格化管理体系的正常运转,与农村社会中各种社会关系、利益关系有着密切联系,是多种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社会内部不仅包括亲缘、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还涉及人情、面子、社会关系等,是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社会有机体^[16]。在网格化管理体系的日常运转过程中,需要灵活运用农村社会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生活常识、日常伦理以及地方文化等来推进村庄公共事务的开展。针对不同的事务、不同的情况,网格化管理体系需要运用不同的手段和途径来完成相应的目标,形成一个让各方主体都满意的治理结果。对码头村网格化管理体系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之后发现,网格化管理体系是一种以现代村庄管理架构为形式、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为核心的治理模式。

三是村庄内生活垃圾分类奖惩机制立足于农村社会,获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生活垃圾分类的奖惩机制设置离不开农村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生活伦理^[17]等方面。每一个村庄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会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结构,需要因地制宜地设定村庄内生活垃圾分类奖惩机制。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实施奖惩过程中,相应的经济社会成本投入较小,却因为处在农村社会的“场域”之中获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都是要面子的。比如,你们家每次垃圾分类都排名靠后,自己也会感觉到不好意思,后面会自觉地把自家垃圾分好。对于那些做的较好的老百姓进行奖励,则会进一步提高他们分类的积极性。虽然评上‘十星级文明户’只有一些电饭煲、煤气灶等少量物质奖励,但相应的荣誉还是很令人自豪的,值得每一个老百姓去努力。”(20220223 红星镇张乡长访谈录)

3. 地方知识的发掘与应用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并不是全新创造的过程,而是结合农村的自然、社会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特点进行地方性知识的发掘与应用,形成卓有成效且长效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米提斯包括了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做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18]。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也具有人类生活环境的内在特点。

其一,日常生活实践知识的发掘。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过程中,垃圾分类的方式与方

法都源自于长期以来农村生产生活中的各类实践性知识。以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来看,最开始的“可腐烂垃圾”与“不可腐烂垃圾”的区分是源自于集体化时期农村生产生活的实践。“在集体化时期,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全村村民都会把各种可腐烂的生活废弃物堆积起来进行沤肥,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肥料来源。”(20220223 码头村裴书记访谈录)所以,大部分中老年人对于生活垃圾分类比较熟悉,自然能够在此基础上开展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同时,基于现有的农村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村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也进行了更新换代。从最开始每家每户上门分类收集转变为村庄内部定时定点分类收集,正是基于当地农村土地全域整治与农民住房空间规划的背景,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这些具有地方性特色生活实践知识的发掘,主要是由当地农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完成并进行创新创造。

其二,现代技术与实践知识的结合。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过程中,地方性知识的应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效结合,实现地方性知识在现代社会的应用。例如,在码头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建设过程中,各类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引入,与村庄内部生活垃圾分类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机制结合起来,形成了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在线抓拍的监管机制。正是基于长期以来当地农民生产生活中各类实践知识的有效发掘,并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效结合,形成了符合当地农村自然、社会、文化等特点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这种结合,一方面,有效地把内生于农村社会内部的实践做法与行为习惯重新发掘出来,让当地居民自然而然地接受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具体方式;另一方面,较好地融入了现代科学技术^[19]以此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便捷化,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体系的全面更新换代。此外,从实践主体来分析,一般是当地的地方精英更擅于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总结、提炼相应的生产生活经验,并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来改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有效开展(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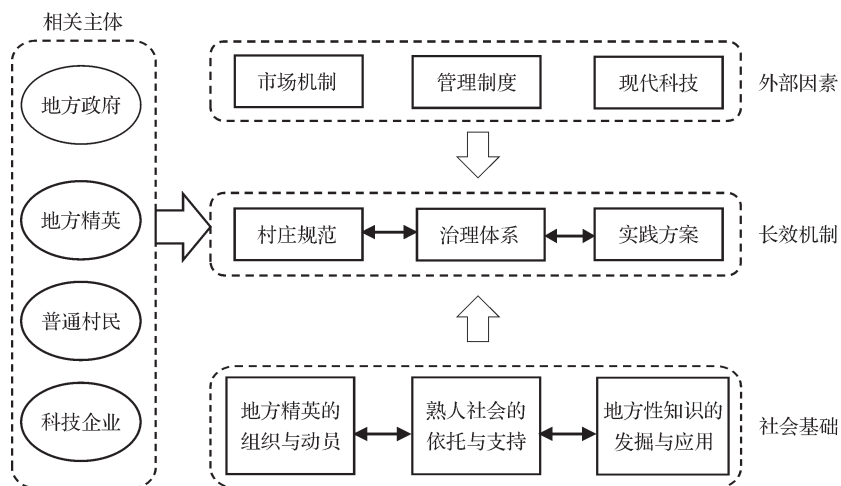


图1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

五、结 论

以地方精英的领导、熟人社会的支持和地方知识的应用为基础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实现了可持续、长效化的治理目标。从理论内涵上来分析,此类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具有较强的结构性、内生性、连贯性特点,是基于农村居民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离不开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主体的支持,具有多元主体共治的特点。内生于村庄社会的制度规范、有效的组织动员结构、可适用的治理技术手段是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基于农村社会的自然地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等,形成符合农民生产生活实际的长效垃圾分类机制。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背后的实践逻辑,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一是,在农村生活垃

分类过程中必须重视农民主体性作用,这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核心要素。以村民自治力量的发挥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有助于在村庄内部形成持久、有效的组织与动员力量。只有发挥了农民自身的主体性作用,才有可能形成具有持续性、操作性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二是,建立符合农民生产生活实践的垃圾分类方式,这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的适用方式。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否则,生活垃圾分类与农民生产生活如出现“断裂”,必将影响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三是,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是农村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调整优化的过程。随着现代性对农村社会的侵袭,村庄空心化、村民原子化状况不断突显,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本质上是对村庄集体行动力形成的有效推动。农民个体在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形成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行为^[20],增强了对村庄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提升了村庄的整体凝聚力。四是,形成了政府管理、村民自治、市场参与之间的平衡状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虽然是地方政府发起并实施,但长效化分类体系的建设却主要依赖村民自治的有效治理以及市场主体的参与,多元主体在垃圾分类机制建设中保持着动态平衡。

总结来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的建设本质上是内生于农村社会^[21]、有效地组织动员农民参与的环境治理过程^[22]。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需要重视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只有农民形成自觉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长效化目标。如何有效地动员与组织农民参与并因地制宜地探索可适用的生活垃圾分类技术与机制,这与村庄内部的地方精英领导、村庄组织协调、村规民约影响以及外部地方政府支持有着直接联系。但是,在实践中,不同的农村社会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有的村庄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形成了符合村庄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而有的村庄却始终无法建立符合当地社会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甚至部分村庄纯粹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政府检查做了一些表面工作。

参 考 文 献

- [1] 蒋培.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的社会基础——基于浙中陆家村的实证研究[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33-42.
- [2] 贾亚娟,赵敏娟,夏显力,等.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模式与建议[J].资源科学,2019(2): 338-351.
- [3] 林建成,安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构建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探析[J].理论学刊,2015(3):85-92.
- [4] 周丽娟,徐顽强.居民视角的新型农村社区参与式治理实现策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86-91.
- [5] 辞海[M].6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 [6] 袁淑玉,郭哈瑜.充分发挥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主导作用[J].人民论坛,2018(26):80-81.
- [7] 张世勇,刘妍.“运动式”环境治理的困境及其突破路径——以清洁取暖整治为例[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33-42.
- [8] 朱卫卿,郑易平.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村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构建研究[J].学习论坛, 2021(5):80-87..
- [9] 贾亚娟,赵敏娟.环境污染感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的影响——兼论责任意识的中介效应[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4-65.
- [10] 荆晨.农村环境内发性治理的社会机制[J].区域治理,2019(24):75-77.
- [11] 吕童.网格化治理结构优化路径探讨——以结构功能主义为视角[J].北京社会科学,2021(4):106-115.
- [12] 王晨.基于公共价值的城市数字治理: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J].理论学刊,2022(4):161-169..
- [13] 马忠才.西北民族社会的阶层分化与治理创新——社会分层及其社会效应的微观实证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5(2):113-120.
- [14] 陈绍军,朱晨铭.生态补偿视阈下农村垃圾分类兑换激励引导机制研究——以安徽黄山市S县生态美超市运作实践为例[J].学习论坛,2020(2):71-78.
- [15]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6] 郭鸿雁.法治、自治和德治:“三治”振兴乡村的协同路径[J].农业经济,2022(10):34-36.
- [17] 魏夕凯,马本.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奖惩激励机制——基于复杂网络演化博弈模型[J].中国环境科学,2022(8):3822-3831.
- [18] 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19] 赵欣.数字技术驱动社区治理的转型研究[J].地方治理研究,2022(4):26-36.
- [20] 陈阿江.再论人水和谐——太湖淮河流域生态转型的契机与类型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9(4):70-76.
- [21] 蒋培.农村环境内发性治理的社会机制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49-57.

[22] 蒋永甫. 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主导与农民参与良性互动的实现路径——基于行动的“嵌入性理论”视角[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5):117-124.

The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Rural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JIANG Pei, LI Weihong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rural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At present,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oject that is deliberately carried out and implemented in rural areas all over the country, but how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has been troubling local environmental managers.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Matou Village in northern Zhejiang Province, we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the village in build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action strategies of different subjects participating in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dig deeper into the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relations, local culture and other social foundations behi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ng-term mechanism. Finally,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institutional norms endogenous to the village society, effective structures of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and applicable technical means of governance are the social found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which reflect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volving multiple subje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ociety.

Key words rural area;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long-term mechanism; social foundation

(责任编辑:金会平)